

论先秦诸子的分派问题

徐 刚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由于出土文献的触发,近些年来,关于先秦诸子的分派问题重新引起了学者的讨论。各种观点的分歧基本上都源于对分派问题的性质认识不清。分派是一种分类学,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时人的分派固然重要,但不见得比后世人的分派更科学;既应注意分派标准的一致性,也应充分理解分派具有相对性,它往往是从属于特定目的的。简单地否定司马谈的“六家”和刘向父子的“九流十家”,都是没有意义的。

关键词: 六家;九流十家;家;先秦诸子;学派

中图分类号:K 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5-0102-09

先秦诸子的分派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从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产生之日起,就已经提出来了。近些年来,由于发现了不少跟战国时代诸子相关的出土文献,经常会发生某一篇出土文献究竟应该归属于当时的哪一家学派的问题。例如1956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了一批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有一句话见于《太平御览》所引的《墨子》佚文,李学勤因而认为竹简是《墨子》的佚文。^①1990年代出土的上博楚简中有《慎子曰恭俭》一篇,是否慎到学派的著作呢?这些都是很难有定论的问题,但由此却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先秦诸子分派问题的重新讨论。

一、先秦无六家说

划分先秦诸子的学派,一般认为始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所归纳的“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稍后是刘歆《七略》所分的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九流十家”之说。这两种分派,成为后世理解先秦诸子思想的模式。

分派其实就是一种分类,这是很好的研究思路。对古代思想作总结的时候,如果把观点相似的学说分为一类,既便于理解各家思想之间的相

互关系,也容易理清思想发生变化的源流。这一点本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即使从19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几乎任何一个学科都涉及分类的问题,现代自然科学可以说是从分类学开始的。可是,颇为奇怪的是,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对先秦诸子的学派分类却成了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研究诸子的思想,分派的确不是唯一的思路。最早写《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胡适,就不是从学派分类的角度去写先秦哲学史的。他主要是以个别的思想家为纲来叙述的,他列举的思想家有老子、孔子、孔门弟子、墨子、杨朱、别墨、庄子、荀子以前的儒家(包括《大学》与《中庸》、孟子)、荀子。这个框架中,虽然有“孔门弟子”和“别墨”这样的派别性质的名称,但主要还是以个人为纲谈论思想,没有用“六家”和“九流十家”这样的体系。1958年,胡适在这本书的台北版自序中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立场,他说:“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我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可惜后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很少能够充分了解这个看法。”

收稿日期:2015-02-10

作者简介:徐刚,男,浙江嘉兴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①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333页。

“这个看法根本就不承认司马谈把古代思想分作‘六家’的办法。我不承认古代有什么‘道家’‘名家’‘法家’的名称。我这本书里从没有用‘道家’二字,因为‘道家’之名是先秦古书里从没有见过的。我也不信古代有‘法家’的名称,所以我在第十二篇第二章用了‘所谓法家’的标题,在那一章里我明说: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至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九流’,我当然更不承认了。这样推翻‘六家’‘九流’的旧说,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依据史料重新寻出古代思想的渊源流变:这是我四十年前的一个目标。我的成绩也许没有做到我的期望,但这个治思想史的方法是在今天还值得学人的考虑的。”^①

傅斯年、顾颉刚等当时听课的学生,都受其很深的影响。顾颉刚在1921年的《读书笔记》中说:适之先生打破了九流,却没有打破儒墨道三家,予意儒墨两家均可成立,惟道家一名实不能成立。^②傅斯年1927年中山大学的讲稿中也说:若九流之分,本西汉中年现象,不可以论战国子家,是可以不待说而明白的;“道家”一词,入汉始闻。^③

胡适说他的方法具有开山的性质,这一点可能很遭人反感。^④但他的《哲学史》的确是率先建立了先秦哲学史的基本研究框架和方法,很多问题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而且也提供了非常好的意见。说他的哲学史是一部开山性质的书,那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他说要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依据史料重新寻出古代思想的渊源流变,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否定的;推翻六家、九流这种旧框架,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但是他的论证的确也存在问题。我们要问的是:如果先秦没有“道家”“法家”“名家”这样的名称,是否就可以

论定,先秦没有道家、法家和名家这样的学术流派呢?

二、早期的回应

第一个回应胡适的,又是冯友兰。1959年,冯友兰在《哲学研究》上就发表了《论“六家”》一文,认为六家在先秦是确实存在的学派:“第一,在先秦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本来有各种的人,他们自称,或者被称为某种人,或者某种专家。第二,这些某种人或某种专家,在他的思想中间,确有一些自己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因此他们成为哲学上一个流派。每一个流派,都围绕着自己的中心思想,同别的流派进行斗争……在先秦的典籍里,我们常看见有‘儒’或‘儒者’、‘墨者’、‘隐者’、‘辩者’、‘法术之士’、‘轻物重生之士’等名称。这些名称都专指一种人……这些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发展成为体系,就成为各种学术流派。这些流派是本来有的,司马谈和刘歆在记录中把他们明确起来,给以相当的名字,其中有些名字,是沿用原来有的名称,例如儒家和墨家,有些是他们给的新名称,例如名家、法家、阴阳家、道家。”^⑤

冯友兰的中心思想,就是先秦虽然没有名家、法家、阴阳家、道家这些名称,但是却存在着这些不同流派的学者;六家九流这种名称虽然不是当时所有,但这种学说和学派在当时却是实际存在的。

因此,若要否认先秦的“六家”,就不能只从名称上出发,而应从实质上否定先秦的确存在过这种学派。1963年,任继愈在《文汇报》上发表《先秦哲学无“六家”》的论文。这篇论文旗帜鲜

①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文集》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0页。胡书1919年首次出版,根据的是1917年在北大的讲义。

②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38—239页。

③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④ 例如李锐在《“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一文中挖苦说:“自诩为中国哲学史开山者的胡适,曾经明确反对使用‘六家’这种做法来描述先秦的思想家。”见氏著:《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⑤ 冯友兰:《论“六家”》,《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6—87页。

明地表示先秦根本就没有六家,他认为司马谈的“六家”说的不是先秦的状况,而是汉代初年流行的六个重要思想派别。例如司马谈说的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根本就不可能是先秦老庄的道家,因为老子在儒墨之前,而阴阳家如邹衍,名家如公孙龙,法家如韩非更在战国后期,老子如何能“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庄子列传》说庄子“剽剥儒墨”,《齐物论》又反对辩论,对严刑峻法(法家)的君臣上下之序也一向反对,如何能说庄子“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先秦倒是有儒家,但是《韩非子·显学》就说过儒分为八;儒家有唯心主义的孔子、孟子,有唯物主义的荀子,根本就没多少共同之处,所谓“儒家”,名不副实。先秦也有墨家,但是早期的墨家是唯心主义的,后期的墨家是唯物主义的,把根本对立的两派合为一家,也失之含混。司马谈把讲到名实关系的学者都列为名家,先秦深入讨论名实关系的,有公孙龙、后期墨家、荀子等,事实上不是一家,而是不同的学派对于名实问题发表的意见,怎能列为一家?法家,倒是体系比较完整,首尾一贯的学派。阴阳家,先秦有唯物主义的阴阳学派,也有唯心主义的阴阳学派。因此,“如果勉强说先秦有所谓‘家’,也只能说有‘法家’。至于儒家和墨家,那只是从师承方面分派的,这是表面划分的办法,是十分勉强的。先秦有的只是老子学派,庄子学派,公孙龙学派等。道家、名家、阴阳家,先秦根本没有过。”^①

三、分派的标准

任继愈的这篇文章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突出,本来需要详加论述的地方动辄以唯心与唯物的标签来处理。他唯一承认法家,恐怕也是受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影响。不过,我认为此文还是很有价值的,他提出了两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是司马谈的六家是对汉初思想学说的现实

分类,而不是对先秦学术的分类。西汉初年,秦王朝的暴政被推翻后,又出现了一次许多学术流派“小争鸣”的热闹局面,《淮南子》一书的杂家特色,正是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状况。董仲舒曾对汉武帝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与司马谈同时,所说的情况应该就是司马谈所亲见的。面临新的统一局面,不同的学派都力图从自己的立场论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司马谈的六家分类,就是对于当时正在争鸣的百家的总结。

二是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划分学派不能根据师承,而要根据其学说的本质。例如孟子和荀子,都自称以孔子为师,都讲仁义,如果从表面看问题,未尝不可以归为一类,但师承不能代替派别,讲仁义也有不同的讲法。司马谈自己认为儒家的标志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是孟子、荀子都难以承认的。至于“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更不只是儒家为然,在孔子以前,周公所定的“礼”就是这样规定的,以后“法家”“墨家”也不是不讲君臣父子之礼和夫妇长幼之别,可见用这个标志以区别先秦的六家也是不够妥当的。即便古人自称他属于什么家什么派,我们也不能轻信他们悬挂的“招牌”,重要的是掌握其本质。^②

这里牵涉到如何划分学派的标准问题,即我们是按照师承关系来划分,还是按照学说的特点或性质来划分?西方学者常常批评中国哲学中“家”这个术语的使用非常混乱。英国学者雷敦和认为“家”有两个方面:一是具体的有时间顺序的师弟子传承,一是对不同的思想潮流或对世界中的问题给予不同的解决办法的思想家的分类。^③这个意见很正确。中国学者李锐也有同样的表述,他说,在先秦时期,表示思想团体的“家”至少有两种意涵:一种是针对有学术师承、学术渊源的学派而言的;一种是针对有相近的学术宗旨、学术兴趣、学术问题的学者群而言的,可能是私淑

① 任继愈:《先秦哲学无“六家”》,《任继愈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页。

② 任继愈:《先秦哲学无“六家”》,《任继愈自选集》,第57、59页。

③ Edmund Ryden, “Was Confucius a Confucian? Confusion over the Use of the Term ‘School’ in Chinese Philosophy”, *Early China News*, Vol. 9, 1996, p. 9.

弟子,或者是同倡某一学说的。不过,他跟任继愈正好相反,他认为分派最重要的是根据学术师承:“战国时期的诸子,很明显地更重视有学术师承渊源的学派这一意义上的家。这一点,可以从正反两面的例子来看。如《孟子·滕文公下》篇曾说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杨、墨先于孟子,孟子所要批判的,应该主要是当时遵循杨、墨思想的人。孟子从根源上批判杨、墨,也就打击了当时的这些人,效果更好。相反,当孟子听说陈良的弟子陈相相附许行后,就赞叹陈良‘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而斥陈相为‘南蛮貊舌之人’。”^①

不过,好像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先秦时期重视学术师承更甚于学说本身。我认为师承关系虽然也重要,但绝不可能比学说本身还重要。先秦时代的人,无不以道自任,不要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便为道而死,也常常在所不惜,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李锐举孟子的例子,但司马迁只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孟子自己说“予私淑诸人也”,连向谁私淑都没说。他根本就没有师承。但孟子一向以孔子之后的道统继承人自居,如果他重视师承甚于学说,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孔子传人的位置呢?这是不符合他自己的主张的。他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里的杨墨显然是有相近的学术宗旨,学术兴趣,学术问题的学者群,因为不可能天下的学者都跟杨墨有师承关系。孟子批评陈相背师,不是因为陈相换了一个老师,而是因为他背叛了老师的正确学说,改学邪说。子贡说孔子“而亦何常师之有”;吴起师子夏,韩非师荀子,但师生之间的差别太明显,难以归入同一个学派;商鞅袭用李悝的《法经》,为秦国制定法律,他们之间没有师承,但是学说的宗旨无疑是相近的。可见师承并不是决定性的。

李锐进一步说:“学术师承渊源比思想宗旨更为重要,因为师承一定,那么学术宗旨也就能大体接近,虽有变化而不远。”^②这话其实自相矛盾。

“师承一定,那么学术宗旨也就能大体相近”,可见师承之所以重要,还是因为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辨别学术宗旨的远近。否则就没有孔子“当仁不让于师”的说法了。柏拉图名言“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真理就是学说,孰轻孰重,较然分明。还是任继愈说得对,根据师承来划分,是表面的皮相之学,真正重要的是学说。比较特别的可能是墨家,《庄子·天下》篇说墨家三派“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墨家有严密的组织,可能涉及很严密的师承关系(其实这一点也有待证明,姑且假定是真的),他们的教义具有很强的牺牲精神。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严密的组织,是为了保证墨家的精神能持续,学说能传承,而不是什么师弟关系本身。只有汉代的今文经学家们,才把师承看得比学说还重要,那很大程度上是生计问题。

四、回溯性的分类合理吗?

美国学者苏德恺(Kidder Smith)对任继愈的观点提出了一些批评。他认为,司马谈所讲的“家”,是一种抽象的归纳,是从先秦到汉初的归纳。汉初没有重要的墨家或名家的思想家,司马谈认为墨家“强本节用”,这是战国初年的墨翟本人的思想。由此可知,司马谈忽略了战国末年的墨家逻辑思想的发展变化,他所注重的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汉初的重要人物或主张。再如,司马谈在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家”这个词,司马迁却不用,到了《七略》才再次使用。《七略》中的“法家”包括商君、申不害、慎到、韩非。司马谈的法家概念与这四个人的主张完全一致。但是在《史记》中这四个人列入《老子韩非列传》《商君列传》和《孟子荀卿列传》之内,而不是归入同一个列传。可见司马谈虽然指出了法家的思想内容,但这个“法家”的类目还是很抽象,他可能没有提出具体的代表人物,否则司马迁就能根据他父亲的分析,把所谓“法家思想家”列入同一个列传中。“道家”可能也是司马谈所创造的。他所描写的“道家”的特点是“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

① 李锐:《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第12—13页。

② 李锐:《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第14页。

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术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由此可知司马谈的“道家”与刘安的《淮南子》思想有很密切的联系。到了汉初才出现“道家”,在此之前只有像任继愈所说的老子学派、庄子学派等等。

结论是,司马谈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当时思想界,他所重视的是概念,而不是各个门派或者不同观点的渊源。他将天下各个历史时期的见解与论述都集合起来,分为六部分。这些概念不再停留在狭义的各“家”内,而是被司马谈归入一些综合的新类目。^①

苏德恺的看法基本上是胡适的看法,但是他把有些问题说得更明白。我认为有两点值得重视:

一是他指出了司马谈的六家是对以往历史上的思想所作的概括,实质上是一种回溯性的概括,虽然他没有用“回溯性”这个词。他认为任继愈说是汉初思想的反映,是不对的,应该是从先秦到汉初的总体思想史的抽象概括。

二是他对司马谈的这种概括做了非常肯定的评价,这是与胡适等人非常不同的。他认为这种概括将中国哲学史概念化,将它提到一个更高的理论水平。

苏德恺的第一点颇耐人寻味。事实上,对于学派的分类,往往是事后的分类,在学派还实际存在的时候,人们往往不容易看清楚问题,只有当它成为历史,才可能真正被理解。很少有学派是自己有意识地组织的,而且,就算是自己有意地组织的学派,也未必能被人认可。尤其是对个人来说,往往不能同意自己被归到某个学派。例如很多人把海德格尔称作“存在主义哲学家”,海氏本人是决不同意的,当然,这也要看怎么定义“存在主义”这个概念。但是后人的分类很可能会受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我怀疑司马谈的六家,将阴阳家与道家分立,可能就是想将汉初那些讲阴阳五行的方士从黄老之学中驱除出去,还道家“于道最为高”的地位。

第二点更是比较通达。这种后人的回溯性的分类,其实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可以讨论它们的划分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有没有更合适的划分,但我们不能说,后人就不可以替古人划分学派。很多人在讨论分派问题时过于狭隘,一看到是后人的划分就一概否定,这种争论就没有意义。例如胡适说:“中国法理学当公历前3世纪时,最为发达,故有许多人附会古代有名的政治家如管仲、商鞅、申不害之流,造出许多讲法治的书。后人没有历史眼光,遂把一切讲法治的书统称为‘法家’,其实是错的。”^②

英国学者鲁惟一的看法也与胡适接近。他说,早期中国的思想史经常被诸如道家、儒家、法家之类术语的随意和不严格的使用所淆乱,在司马谈的那个时代,把某些思想家完全归入他所整齐区分的六家,也许是不可能或不合适的。这些学派有很多共同的基础,不大可能对他们做出精确的界定。刘向刘歆的“九流十家”的整齐区分也是不合理的。他认为,刘向刘歆的区分首先并不是有意对中国哲学进行分析,它实际上是图书馆里负责收集文献和编排图书的学者们的著录工作。在这种工作中,由于实际操作上的原因而进行分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例如要给一篇很难分类的作品加上一个标题,并强行归入某类。刘向刘歆所确立的类目与司马谈所强调指出的六家有部分一致。然而,刘氏父子所涉及的著作比司马谈所处的时代要早好几百年,或许会早8到9个世纪。因此,刘向刘歆必然会创建出比司马谈的六家更多的类目。中国学者接受了刘氏父子著作中所遵循的分类,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一种传统惯例: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把这些类目回溯性地应用于大量的中国文献中。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是错误的;他们在根据一个或许并不适用于早期中国著作的标准强行分类。^③

鲁惟一的措辞虽然比较温和,他只是说,我们不能无所保留地接受这些分类,但其实际的意思还是认为汉代人的分类,不能适用于早其几百年

① 苏德恺:《司马谈所创造的“六家”概念》,《中国文化》第7期,第134—135页。

②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文集》第6卷,第395页。

③ 鲁惟一:《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王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2页。

的先秦时代。不过,鲁惟一也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于图书的分类是否能反映对于思想的分类?如果不能,那么我们依靠什么?蒙文通早已指出过,书的分类与思想的分类不同,校书固当依书之内容,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至若辨章学术,则应就其统纪,而观其全,方足论定。^①鲁惟一认为图书分类不能反映思想分类,除了因为图书分类会迁就书的内容而歪曲思想分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中国思想的记录并非出自单个作者之手。他说,这些作品是众多作者合作的产物,而作者们的名字却常常没有被记录下来。这部分地是由于当时所流行的风气:名流们为了增加自己的声望,邀请大批饱学之士会聚一堂,向他们咨询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并且把他们商讨的记录编纂成书。于是,有些作品的内容只能是折中性的,因为他们源自不同人的看法。这些不同有时候——但绝不总是——可以厘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吕氏春秋》这部文选,其中包括奇闻佚事,行事箴规,哲理陈疏等内容。该书成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其中所包含的观念,后来时而被归为道家,时而被归为儒家或法家。还有《淮南子》,通常被称为“道家”,但它把相当多的力量归因于天的思想方式,却带有“儒家”的特质。《荀子》的哲学与《商君书》《韩非子》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但荀子通常被归为“儒家”,而不是“法家”。

不过,在我看来,先秦诸子的书出自众手,恰恰是学派的证明,而不是反证。因为出自众手,一般都是持相似学说的人;如果是持不同学说的人,要写就同一本书,也必然基于某种共同的认识。像《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确有很强的折中性质,所以传统上也归为杂家。杂家的杂,不是杂乱混合,而是折中调和的意思,虽然来源于不同思想的学者,却可以熔铸成一种独立的学说。

五、先秦的学派观念

那么,先秦时代的学者,他们自己是如何看待分派问题的呢?先秦时期的“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雷敦和对于作为学派的“家”的两种概念的区分。其实“家”的概念还不限于有无师承这两种意义。《汉书·艺文志》把每一本书的作者都称为一家,其所载诸子书有“百八十九家”。因此,广义而言,凡是著述,都是一家之言。而这,可能反倒是学术称“家”的本义。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用“家”来指称学者的,见于《庄子·则阳》:“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义,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又《韩非子·定法》:“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这都是战国末期的文献,“家”的意义跟《汉书·艺文志》每本书的作者就是一家的概念相同。这可能是作为学术流派的“家”的最早意义。

因此,在战国时代的著作中,提到学者或学派,一般是“百家”。例如《庄子·天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荀子·成相》:“复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说穿了,是一人一家。因此,很多著作论及思想流派时,是单个分别论述的,例如《荀子·天论》说:“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诋,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解蔽》篇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又《吕氏春秋·不二》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臧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类似的话也见于《尸子·广泽》:“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学者没有分类或分派意识。例如同样是《荀子》,其《非十二子》篇中就把十二个人的学说两两归为一组,分为六组:它嚣、魏牟一组,陈仲、史鳢一组,墨翟、宋钲一组,慎到、田骈一组,惠施、邓析一组,子思、孟轲一组;并且总结了每一组中两个人共同的思想主旨。这

^① 蒙文通:《法家流变考》,见《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88页。该文发表于1949年成都出版的《图书集刊》第9期。

种将持同一学说的学者两两一组的排列,就是一种学派分类。下文说“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则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可见论人虽然是“十二子”,论学却只有“六说”。又《庄子·天下》篇将墨翟、禽滑厘并列,宋钘、尹文并列,彭蒙、田骈、慎到并列,关尹、老聃并列,庄周独列,惠施、桓团、公孙龙并列,这也是相似的学派分类。而《韩非子·显学》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这是学派内部的再分派。

可见,当时对于学派的总结无疑已经有了。《孟子》“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其实也是学派的划分。这种总结可以代表当时一部分人的观念,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比后世的总结更科学,却未必然。《天下》的宋钘和尹文并列,而与墨子殊派,《非十二子》的宋钘却与墨子同类,我们就可以知道学派的分类本来就带着分派者自己的有色眼镜,跟他们各自立论或批判的目的有关。当时的分派未必合理,后世的分派未必就劣于当代。

六、分派的实质

司马谈的六家和刘向父子的九流十家,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后世的回溯性的分类,而是划分的标准是否统一。六家与十家,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得清楚,学派不是针对学说的划分,而是以学说为标准对学者的区分;如果只是对学说的区分,区分的结果不是学派,而是学科。例如名家,胡适认为先秦无名家,从他的划分标准来说,是有道理的,他说:“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这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试看近世思想史上,程朱陆王的争论,岂不是一个名学方法的争论?朱晦庵把‘格物’解作‘即物而穷其理’,王阳明把‘格物’解作‘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岂不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名学方法的争

论吗?南宋的朱陆之争,当时已认作‘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条路子的不同,那也是一个方法上的争执。”^①胡适把名学看作是思想的方法,这并没有错。但问题是,它也完全可以是一门学科,可以专门研究。如果有人专门研究这种学问,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就不能是一个学派,名家为什么就不能存在呢?就如同古希腊的智者学派。按照古书的记载,惠施、公孙龙这些人,除了研究名学外,他们也有其他的很多主张,很可能接近墨家。例如《吕氏春秋·应言》载,公孙龙对燕昭王讲过偃兵,《审应》篇载公孙龙对赵惠王谈过偃兵要“兼爱天下”。但是他们最著名的,无疑是名学。《公孙龙子·迹府》篇云:“龙与孔穿会赵平原君家。穿曰:‘素闻先生高谊,愿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此术,则穿请为弟子。’”龙曰:“先生之言悖!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耳。今使龙去之,则无以教焉。”因此,一个学者,并不一定专属于一个学派,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他可以属于不同的学派。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当时的人,对于同一位学者,会有不同的归类;同一位学者,可以兼属不同的学派。这反而是正常现象,所有的分类都不可能是整整齐齐,没有例外的,没有例外的分类反而更值得怀疑。

阴阳家的情况可能跟名家相似。像邹衍、邹奭、张苍等人,都见于《汉志》的阴阳家,这些人显然也研究别的学问,阴阳只是他们研究的一种,但可能是他们最擅长的学问。因而称他们是阴阳家,应该也是正确的。

胡适对于法家的看法跟名家类似。他说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没有所谓的“法家”。如果有法理学,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那些谈论法理学的学者称作法家呢?胡适一方面说“法家”这个分类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说:“但法家之名沿用已久了,故现在也用此名。”^②既然是错的,怎么能够“沿用”?原因很简单,如果取消“法家”,那么他们算哪个学派呢?让他们每人都“独立”,不分派,还是再换一个别的名字呢?分类,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方便,它是与特定的目的联系的。

①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文集》第6卷,第160页。

②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文集》第6卷,第160页。

把法家瓦解之后,我们可能反而看不清楚这么一群人,他们在法治上有哪些主张,他们的学说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胡适还是不得不用“法家”。

六家之中只有儒墨很难否定,即使是那些不同意六家说的学者,大多也不愿意否认。例如英国的葛瑞汉就说:“司马谈将其划分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这些思潮虽然大都只不过是后人回述时做的区别,但儒墨无疑是以师徒代代相传来维系的真正的学派。”^①

但是名家、法家这样的分类,的确跟儒家、墨家的分类有所不同。名家和法家,是根据学者研究的对象来区分的,而儒家和墨家,是根据学者学说的宗旨来区分的,因而,这种划分,根据的标准就不一样。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标准,让我们感觉到司马谈的六家似乎是不同的东西,我们觉得有问题。是划分标准的不同导致了分类的不和谐,使之成为一个不同质的系统。我们可以讨论,是否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分类,但无论如何,这种划分对于我们认识先秦诸子的学说是有帮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觉得先秦可能没有这六家,但还是愿意继续使用这种分类的原因。例如史华慈说,大多数中国传统的对于分派的观点,源自于汉代初期的古籍整理者,他们将道家、法家、杂家之类的名称强加到那个时代的复杂思潮之上;某些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也试图为我们提供他们本人对那个时代学说潮流所作的描述,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道家、法家或杂家,他们论述了某些单个的人物,这些人物后来被归入到大的范畴中,这些范畴被看作是众多思想模式的代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汉代学术史家在回溯意义上使用‘道家’和‘法家’范畴的时候,这些汉代学者就完全错了,因为至少这些范畴作为一般性的思潮,还是可以跟其他学派区分开来讨论的。^②

九流十家的问题可能更容易引起争议。十家比六家多了纵横、杂、农、小说四家。农家显然也是根据研究的对象做的分类。杂家反映了战国晚

期到秦汉时期各家学说互相学习,逐渐混同的趋势,这是根据学说宗旨做的分类。最麻烦的是纵横家,它是根据职业做的分类,战国诸子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纵横家。张尔田就说过:儒、墨、名、法,其出而问世,无不兼从横之学;故孟子历聘齐梁,荀卿三为祭酒,墨子胼胝以救宋,韩非说难以存韩,公孙龙说平原以止邯郸之封,尉繚子说秦王以乱诸侯之谋,商君争变法,李斯谏逐客,其与结驷连骑抵掌华屋者何以异耶?亦可见从横一术,战代诸子人人习之,无足怪者。后世迂儒既不知从横出于行人之官,又以苏秦、张仪为深耻,而后古人专对之材始为世所诟病矣。^③ 所以纵横家的划分是根据另一个独特的标准。但是战国时候游说诸侯的现象太普遍,游说的技巧很值得研究,作为一种游说的技术,纵横家也不妨存在,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个职业。

最后的“小说家”,基本是对于图书的分类,要说先秦真正没有的“家”,恐怕就是小说家了。先秦时代虽然有一些可以称为“小说”的著作,但是恐怕没有那么一种人专门从事道听途说的“工作”,恐怕也不会有这样一种学说可以研究。不过,后代的小说,逐渐发展成为志怪、传奇等故事,倒也证明从图书分类法的角度考虑,这也是一种合理的学术分类。

七、结 论 -

分派本质上是一种分类学。分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体的分类会随着分类的目的和需要而改变。因此,分派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第一,分派是出于特定的目的或实际的需要,没有任何目的的分派是没有意义的。《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是二分法,当然比较粗略,但未必就不符合当时的天下大势;《非十二子》提到六派,是出于批评当代学说的需要;司马谈提出六家,是出于总结“治道”的需要;刘向父子提出九

① 葛瑞汉:《论道者》: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像任继愈那样,连儒墨也一并反对的学者,是极少数,例如顾颉刚早年就说过:“战国时只有百家,并无九流。九流者,刘向刘歆之所定。不独名家、杂家谬妄,即儒家、道家亦非实在。”见《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第229页。

② 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181页。

③ 张尔田:《史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页。

流十家,是出于图书分类的需要,只有实际需要的不同,并非对与错的问题。

第二,分类应遵循相同的标准,才能产生内部一致的分类系统。师承、学术宗旨、研究对象、职业、著作等各方面都可以作为分类的标准,但是不当在一个系统内部,有时用师承,有时用学术宗旨,有时用学术对象,有时用职业,有时用著作。“六家”和“十家”的分类,就是按照不同标准分出的学派,它不具有内部的一致性,并非一个同质的系统。但是,由于先秦资料的缺乏,单独按照某一个标准来划分,可能是不大现实的。为了理解或者研究先秦学术的方便,这种按照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派别,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第三,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就可以进入不同的学派。《荀子》将宋钘归入墨子一派;而《庄子》将之归入尹文一派,而与墨子异类,就是如此。公孙龙的主张有跟墨学接近的,着眼于他的辩论,可列为名家;着眼于他与墨家接近的地方,则归为墨家也未尝不可。如果仅仅从师承的角度看,韩非归入儒家也未必就完全不可以;但是

从学说本身的角度看,那就只好分立。

第四,划分的学派可以有精有粗,有大有小。有些表面上看起来可以归为一个学派,但可能包含了很多不同主张的学者。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是如此。老子和庄子,着眼于同,都可以归为道家;着眼于异,可以分别为老子之说与庄子之说。同是法家,商鞅重法,申子重术,慎到重势,而韩非要求法术势结合,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我们在评论古人的分派概念时,既要看到当时人自己的分派,也应参考后来人的分派,当时人的分派未必比回溯性的分派更科学;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分派都只能是回溯性的,只不过回溯的时间间隔可长可短。同时,我们既要注意分派的标准,也要注意分派的相对性;分派的标准直接导致分派本身的合理性和内部的一致性,但是任何分派都要受到实际材料、研究目的的制约,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这中间,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应随时保持分派的相对性观念,才能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作出合理的分派。

Some Issue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Pre-Qin Philosophers

Xu G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riggered by the documents unearthed in recent years,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the academic schools of Pre-Qin philosophers have generated new discussions among contemporary scholar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ner logic of the views put forward by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since Hu Shi(胡适), pointing out that their differences stem from their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classification properly. The classification of academic schools is an issue of taxonomy, and therefore it is also a relative conception. True that the views held by the ancient scholars are important, but their ways of classification are not necessarily more scientific than those put forward by the scholars in later times. Moreover,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istency of the criteria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academic schools, and also fully understand the relativity of the classification which often serves a specific purpose. It is meaningless to simply negate the view of Six Schools of Philosophy by Sima Tan(司马谈), or the view of Nine or Ten Schools of Philosophy by Liu Xiang(刘向).

Key words: view of Six Schools of Philosophy by Sima Tan(司马谈), view of Nine or Ten Schools of Philosophy by Liu Xiang(刘向), school of philosophy, Pre-Qin philosophers, academic school

(责任编辑 管 琴)